

■第一阅读

尊重生命 抵抗遗忘

□雷 达

《非典启示录》的写作姿态和探索精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正如作者所说,一个民族若不能把灾难变成财富,就是真正的不幸,然而,倘若要真正把灾难变成财富,却又谈何容易。拿对非典的反思来说,并不是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发一通豪言壮语即可奏效的,它需要深刻冷静的反思,需要科学求实的态度,需要重回现场,需要重新梳理时间表和许多重要的节点,这才有可能得出比10年前更深入、更可靠的结论;与此同时,还要求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站在以人为本的、呼唤伟大人道精神的高度,总结一些规律性的经验,才能具有真正的启示力。王宏甲的这本书正是向着这个目标的努力。

作者说,传染病是人类生活中的大敌。然而,不论古代的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还是20世纪令人惊骇的艾滋病,都还没有追踪出最早的病毒从哪儿来,如何人传人,传到世界各地,而只有SARS,第一次呈现出“或可如此追踪”的可能。他的这次写作,也就是一次追踪和溯源。当然不仅仅是对病源的学理性的追踪;主要的、是对全民族众志成城,狙击非典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充满大爱与美德的民族精神的追踪,也包括对许多教训和失误的追踪与反思。作者说,10年了,抗非典虽告结束,但非典的伤口还在,还有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他的写作,也是为了看得更加清楚。

王宏甲的写法是,拉开时间距离,重归现场,重温噩梦,虽有理性的冷静,但其叙述过程是比较感性的,为的是尽可能让事实还原,其主体是隐蔽的,沉得住气的,对一些重要事实照着本来面貌呈现,并不大声疾呼,也不作简单的评判,甚至借用了一些小说的叙述手段。在谈到一些相关重要人物时,穿插得体,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回溯非典发生、传染、救治、遏止的全过程中,作者力求全面而客观。全书便是在这样的基础

发生于2003年春天,影响了中国,波及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典病毒,造成巨大的灾难和恐慌。10年之后的今天,也难以使人忘记。但是,人们记忆的方式似乎各不相同,有人记下了灾难期间的紧张和奇异遭遇,有人记下的是遭到非典袭击后自己或亲人的苦难以至生命失去的悲痛,也自然会有很多人,依然记忆着非典肆虐期间,那些无畏地战斗在第一线,冒着很大的风险乃至牺牲,抢救病患者的医护人员,以及他们的非典经历。然而,记忆固然重要,但比记忆更加重要的是认真的回望和理性科学的灾难总结。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非典启示录》,正是在“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把灾难变成财富,就是真正的不幸”的意识和思想下出现的重要作品。所以,虽然距离非典有10多年的时间,可依然具有很大的新闻信息性和明显的现实思考启示价值,并不会使人感到是陈年旧事,是在炒冷饭。

当年,王宏甲也曾经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奔走在抗击非典第一线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对于非典的危害和猖獗情形是有很多直接的见证和了解的。但是,因为当时情况的繁杂和紊乱,即使最辛勤的作家,也很难对非典病毒的来龙去脉及其危害影响作出全面完整的观察和认识。但是,多年之后,随着灾害的逐渐平息,加之各种总结和内部情况的公开,非典的原本起始面貌就渐渐地清晰起来了。因此,王宏甲的这部《非典启示录》,是第一本近乎完整全面、清晰具体地对非典的发端和起始过程给予了追踪的作品。这种看似有些还原真相和文献整理特点的追踪,对于了解和认识当年的灾难非常具有价值,即使对于以后的疾病防治也会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自然,王宏甲对事件的回述追踪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调查,而是文学化的访问和记录,其中对于人和事的记述,在事实的记录中会包含有不少的情感精神和人性的悲悯。在涉及到很多病人、医生和事件矛盾情景的时候,作者都没有从单一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对象,而是在接近最合理科学和人道的基础上看待一切。例

上,展开了对真实和真相的反复认识。

作者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眼光。例如,在叙述阿芳、黄杏初、周老板等几个非典的最早的传染者时,作者就显得非常宽容和理解他们内心的苦闷。这些最早的传染者,其发病过程、传染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神秘性、恐怖性,他们确实给许多人包括医护人员带来了生命危险甚至死亡,危害极大。于是,他们中有的人虽痊愈出院,却因此而产生巨大的道德焦虑、痛苦不堪,觉得对不起天下人,以至失踪、避世。他们中也有像周老板这样刁钻、不讲理的,他被称为毒王,他的破坏性确实吓人,于是连带的问题便是,像这样的人该不该抢救?抢救他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但在作者看来,这些传染源也是无辜者,对它们同样要充满爱,要一视同仁,要全力拯救。

健忘症是可怕的。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成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症候。这本书就是为了抵抗遗忘。“抵抗”不能流于空喊,那就要看你是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怀人,把生命放到第一位,能否用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了。对作者来说,要看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事件本身时空意义,达到了触发更为长久的思考和更为强烈广泛的感染效果,要看作家通过深入探究,有无化灾难为智慧,化灾难为科学,化灾难为财富,化灾难为清醒的能力。这本书通过全面回顾战胜非典的过程,从广州保卫战到北京保卫战,再到香港保卫战,从卫生与民生话题引到当今的医疗改革,关键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力肯定人的主体能力,发扬民族精神。

报告文学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感、现场感而征服读者的文体,作者总是不畏艰险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迅速、真实地把第一手最鲜活的事实提供给读者,不少佳篇为此受到读者的激赏。然而,报告文学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事后反思的功能:在经历了时间的



沉淀和淘洗之后,富有哲理和人文深度地对以往重大事件进行反刍和反思,提供有价值的启示。这后一功能似乎还没有得到长足的发挥。《非典启示录》在这方面同样带来了启示。

让历史有益于未来

□李炳银

如,像对“毒王”应不应该救治的问题;对于抢救有很大的风险,医护人员要不要实施抢救的问题等都是这样。因此,王宏甲的事实原貌追踪,不是冷冰冰的进程记录,而是伴随着还原事实原貌的过程不断播撒着浓厚的观察感受和温暖情怀的过程。其中对于很多人的不幸和医护人员的勇敢牺牲,对于很多投身非典防治的各种人员,均有十分真诚和文字的尊重。这种来自作家和文学的情怀,是文学在面对历史事实时常有的表现,但正是在这个地方区别着历史和文学的态度与作用。

《非典启示录》的另一价值在于“启示录”,在于作家对非典灾难举一反三的追问和科学认识总结。作家从非典防治的起伏过程中,再次强调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强调了尊重不同的科学见识的重要性,强调了用不同的手段、方式救治病患的重要性等。而在这些方面,当年的政府相关部门和医疗单位都是有不少可以总结的地方。对于非典灾难的后续工作,作者特别强调了要遵循中国传统医疗观念,要“治未病”,必须在防治方面下大力气的主张,认为,这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最为有利和有力地对待疾病生成泛滥的方式。由非典灾难,作家又延伸思考到中国的医疗体制和管理,联系到现实的医患矛盾等很多对象。而这些问题,事实上都可以从防治抗击非典过程中有所启发。作者真不希望非典过去了,就一切都又过去放下了。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中,追寻和发现依然鲜活的现实话题,在对过往的事件中感受历史和思考未来,这就是《非典启示录》最用力和用心的地方。因此,它理应让我们给予

充分的关注。

王宏甲是当今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的作品时常以认识角度独特和思考深入、思辨力强而显其个性。无论是他的成名作《无极之路》,还是后来的《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等,都具有这样的智慧丰盈特点,时常会让人对社会现实信息的收获中有很多理性的提升和启迪。有不少的人,虽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多年,其实对于报告文学的特点特性还存在懵懂的理解。总以为,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个真实的事件人物去写,完成了对事件人物的介绍描述,似乎就完成任务了。这样的作品,也会有一定的社会信息性,但它们其实与报告文学的圆满和成功距离甚远。报告文学自然是面对现实事件的矛盾和人物,但作家不应该简单机械地以完成事实描述为目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是在精心地选择了那些具有社会关注热点的对象之后,进而借助这些对象和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借重真实,表达自己,这才是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目标。王宏甲对于报告文学的这个特性显然理解深入,所以,他面对任何一个新的题材对象,都会有自己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理性乃至独特的主观解读。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王宏甲的报告文学作品就独树一帜,具有别人难以重复和替代的作用。我相信,这部《非典启示录》,不仅是王宏甲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收获,也必将是中国医疗史、社会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和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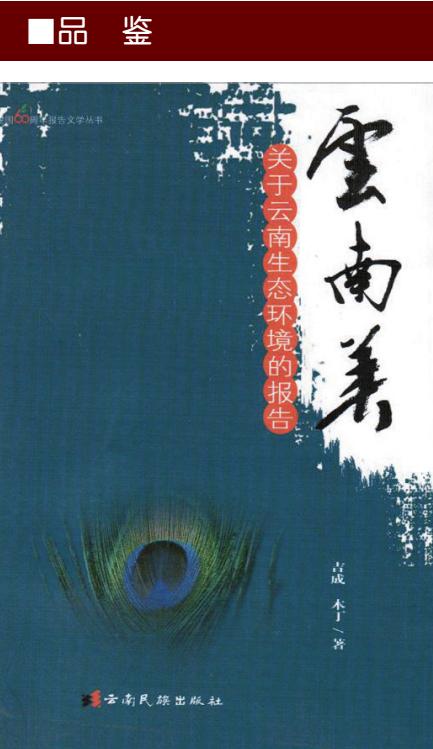
(《非典启示录》,王宏甲著,海峡书局2013年12月出版)

吉成、木丁的长篇报告文学《云南美——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是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度重点扶持项目。我们当时在评议这个选题时,认为作品切近现实和国计民生,主题重大,属于尤其值得倡导的生态文学的一部新著。两位作者——杨红昆(木丁)和蒋吉成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因此同意对这一选题进行扶持。

蒋吉成和杨红昆显然是“有备而来”,为创作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在此之前,杨红昆还出版过如报告文学集《足球、足球》,长篇报告文学《跨越高黎贡山》等纪实作品。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们躬身涉足书中写到的云南的各个市县,深入采访探究,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保证了作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作品完成后,首先在《中国作家·纪实》2010年第6期发表,随即结集出版。

报告文学是中国特色的文体,在中国发展得最充分、最成熟,成就亦可谓最大。有人将之称为“时代文体”。时代变革了,社会发展了,报告文学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文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此都有疑虑。但是,倘使我们认真审视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自身的嬗变与更新,便能看到这种文体具备长久的生命力。2010年,《人民文学》力倡“非虚构创作”,似要对报告文学进行重命名,进行变革或者改弦易张。原因之一是,传统报告文学带给了读者相当严重的审美疲劳——著作化、长篇风盛行,广告宣传、枯燥乏味的好人好事表扬稿,片面“歌功颂德”的颂体报告铺天盖地;二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丧失了参予现实生活的胆魄与能力,战斗性、批判性、思辨性和政论性等品格削弱。针对不少作家写作资源衰竭的境况,《人民文学》号召作家走向大地,走近人民,以非虚构的创作手法直击社会底层草根生存、逼近当下、关注焦点、揭示现状及问题,推出了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些作品。

但是其随后推出“非虚构小说”等,并未获得学界内外广泛认同,显示出后劲不足。而传统报告文学以朱晓军为突出代表,以《天使在作战》《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让百姓作主》等作品,较好地延续了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入世文学和



“为人生”文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了报告文学界的普遍叫好,反映出报告文学的无限潜力与生机。

《云南美》正是这样一部传承传统、积极参与现实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文学,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担当精神的作家。《云南美》是一部描写云南大地生态现状及其各种问题的长篇纪实,堪称云南生态思录。这是一篇生态报告文学。生态报告、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重大主题,

生态报告大有可为

□那 非

实际上也就是关注人类自身的处境及未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作领域。

吉成、木丁两位作者无疑是颇具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作家。他们忧心忡忡地注目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七彩云南,将目光投射到锦绣大地上每一处污点或伤疤,揭示出常人不易发觉或关注到的诸多生态问题。比如曾经的生态大破坏、滥砍滥伐、大片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比如大面积推平橡胶种植不加限制,导致西双版纳珍贵的热带雨林资源消失;比如缺水、干旱的危害,提出无水则何以成傣族的论点。比如,在景洪找不到雾,雪山逐渐消融,大理“风花雪月”美景和洱海帆影渐行渐远等,作者对此感到深深的失落。对于林业发展、农垦毁林开荒、乡镇企业这“三把刀”对资源的索取掠夺,对经济开发造成的污染、旅游带来的生态破坏、狼毒对香格里拉草原的毁坏等,作者都表示了深切的忧思,作出了独到的思考。对程海螺旋藻开发、排污工程治理不了了之等,作者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描写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云南美》并不是一部颂扬稿,不是简单片面的赞美诗式的颂体报告。本书的主题正如作品开头引用的、在云南世博园人口处刻着的印第安索瓜米族酋长的话:“大地并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万物相互效力。”——开篇即鲜明地确立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如何相处这一主题。

作者对生养自己的云南大地满怀深沉的爱。正像艾青在诗歌中所吟唱的那样——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因为对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怀着深爱与忧思,作者越发希望土地上的人与万事万物都能

■书斋札记

读陈德宏的访台文章,首先想起的是1993年的那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敦煌笔会”。

那次笔会是由我所供职的《中国作家》、陈德宏所供职的《飞天》及金川公司联合举办的。

之所以说终生难忘,是因为有一批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爱戴的有实力、有影响、有名气的作家——唐达成、陈丹晨、蒋子龙、程树榛、杨匡满、袁和平与会,走到哪里都受到文学发烧友的“围、追、堵、截”,在“文学边缘化”不绝于耳的声浪中,令人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还因为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独特的魅力,陈德宏等《飞天》同行的精心策划,及金川公司热情友好、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当然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台湾画家李锡奇和女诗人古月伉俪参加了笔会,开创了海峡两岸文艺家共同参加文学笔会的先河。这次笔会明显的效果是产生了一批写敦煌、写丝路、写金川的文学作品,而长期巨大的无形效果是锡奇兄、古月大姐产生的浓浓的大陆情结,而我们则产生了浓浓的台湾情结……

李锡奇是台湾开现代派绘画风气之先的人物,由于他对于艺术风格的不懈探索与追求,所以享有“变调鸟”的美誉。由于他与古月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广结善缘、极佳人脉,所以他们的家变成了台北文友经常聚会的“文艺沙龙”,被散文家林清玄称作台湾的“艺术重镇”,并说“将来如果有人要写台湾现代艺术史,古月的家是个重要的地方”。其实锡奇兄还是两岸文艺界交流沟通的先行者、开拓者,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他就组织台湾的文艺家访问大陆,不断邀请大陆的文艺家访问台湾,进行双向的沟通交流;在两岸关系阴晴不定交流并不顺畅的年月,大陆的许多作家艺术家访台,往往就住在他们的家里,因此我要说,他们的家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艺术重镇”。如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性互动,越走越近,越走越热,而锡奇兄也愈加忙碌,忘掉“古稀”,带着他那“鹤发童颜”的标志性形象,穿梭于海峡两岸,奔走于祖国各地……

1993年的那次“敦煌笔会”是“前因”,而陈德宏的访台大散文是“后果”。

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与分裂,造成了台湾文化的隔断与孤绝,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的疏离与情感的创伤。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两岸人民的民族感情,恰似陈年老窖,经过岁月的尘封,经过隔断与孤绝的酿造,愈浓愈烈、愈醇愈香……陈德宏的大散文《两岸诗酒浯江情》,从头至尾字里行间弥漫着的正是这种浓浓的民族感情和情同手足的兄弟亲情。这就是民族凝聚力。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屡遭战乱屡被分裂而最终又战胜困难走向统一的内在凝聚力。

《两岸诗酒浯江情》不是一般的游记,亦不是一般的访问记,而是作者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参访之后形成的酣畅淋漓的文字。香港、澳门的相继顺利回归,雪国耻,扬国威,令全世界的华夏儿女扬眉吐气,心舒畅。由此,台湾问题便凸显了出来,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从具体时间上讲,又巧遇千禧龙年,恰逢台湾“大选”,许多人有了新的希冀与憧憬,也怀着某种惴惴与不安;而一些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则乘机登台亮相,进行淋漓尽致的表演。此种近距离的观察,置身其中的感受,无疑为作者的涉笔增加了许多社会及人文的丰富而生动的内涵。

距离产生美。神秘产生美。台湾宝岛依然是许多人心驰神往的地方。然而还有更近更遥远更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与祖国大陆咫尺天涯的金门岛。据我所知,陈德宏不是最早涉足金门的大陆作家,也不是最早涉笔金门的大陆作家,然而却是叙写金门历史文化,述说它的往事今尘、擦开这座闻名世界的战争岛的神秘面纱的最深入、最全面、而又写出了特色的大陆作家。足见陈德宏的专注、用心及他的一往深情。

以前我们对台湾的文学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了解,犹如雾中观花——花非花,雾非雾,朦胧熟悉而陌生;而今作者与台湾同行朝夕相处,携手并肩,倾心交谈,识人识文,识面识心,自然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理解与交流……

历史纵深,文化视角,以文会友,民间叙事,彰显了德宏文化大散文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发展,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两岸作家互访,写出更多更好更有质量更有文采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为两岸读者大众架起交流沟通的文学桥梁。

(《两岸诗酒浯江情》,陈德宏著,台湾大堯文创出版社出版)

采访当事人、知情者,创作态度严谨认真。

作品资料相当翔实,充分运用各种数据,很具说服力。作者还善于从历史沿革、古今对比中去描绘环境。比如写到滇池时,引用老百姓的口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抽水灌慨,70年代水还可爱,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样的顺口溜无疑生动地表现了滇池环境恶化的历史过程。

四

《云南美》作者的创作是真诚的写作,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在写作手法上注重客观、真实的呈现。如实记录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危机所在,引起警醒与关注。

作品通篇运用散文化的笔法,以优美的笔触描写自然界的和谐美景,以从容不迫的叙事讲述云南生态状况。比如写雨林奇观、古城风土、云杉坪的雪山之惑、泸沽湖、程海等,皆可独立成文,本身就是一篇篇很好的散文。在结构上,作品采用了移步换景、边走边看边写的方式,读者跟随着作者的步伐走遍了云南大地,看到了一处处美景,同时也关注到了诸多生态问题,叙事自然流畅。

当然,作品在生动情节细节的开挖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可以更加深入,如此,或许可以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及感染力。

《云南美》的创作昭示着生态报告具备无限生机与活力。生态报告大有可为。云南是一座自然生态的宝库,也是生态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自然、人文、社会、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等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个“发现边疆”的热潮,许多作家热衷于书写西藏、新疆这样的边地题材,推出了一大批有社会反响的作品。相信在云贵高原,在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也一定能够产生出一批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生态文学作品。吉成、木丁的《云南美》大概只是揭开“云南生态文学”雪山一角吧。

(《云南美——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吉成、木丁著,云南民族出版社)

难忘那次“敦煌笔会”

□高洪波

